

清代东北移民会馆的兴起与近代转型

范立君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四平 136000)

[摘要] 清中叶以后,在关内移民东北浪潮下,在传统乡土情结和同乡共同利益的驱动下,东北地区移民会馆相继兴起。移民会馆多集中在政治、经济中心及商业较为发达的商埠,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近代以后,在战争、外国侵略、移民心态等因素的影响下,移民会馆逐渐走向衰落,一些会馆被废弃或改作他用。民国以来,一些会馆为适应时代需求,开始调整管理模式和职能,有些会馆则直接转变为同乡会组织,完成了近代转型。移民会馆在稳定东北地区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传播地域文化等方面影响深远。

[关键词] 清代;东北地区;移民会馆;同乡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2991(2022)05-0028-07

会馆是明清时期客籍同乡在异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是以地域为纽带的民间团体。学界关于会馆的研究重点多侧重于对商业会馆、科举会馆的阐释,研究地域多集中于北京、苏州、上海等商业大城市。其中,关于移民会馆的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主,对四川、云南地区的讨论尤多。东北地区的移民会馆,因分布零散、现存会馆建筑少、文献记载缺乏等原因,其研究多夹杂在东北慈善救济史、东北商会史中,相关论著偶有零星、片段的提及^①,专题性的研究尚付阙如。有

鉴于此,本文对东北地区移民会馆创设的背景,以及会馆的数量、分布、特征、转型等进行初步研究,以期对推动中国会馆史、东北移民史研究走向深入有所助益。

一、清代东北地区移民会馆的兴起

会馆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最早出现于明朝永乐年间,芜湖人俞谟在北京前门外购买基地,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会馆——“芜湖会馆”。当时的会馆主要是由各地在京为官者为方便家乡学子进京赶考所建,为考生提供临时休息、食宿之地,

① 代表性论著有:郑鸿笙:《中国工商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国闻周报》,1925年第19期;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正中书局,1946年;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吕作燮:《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姜守鹏:《清代前期的会馆和手工业行会》,《松辽学刊》,1989年第1期;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蓝勇:《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董瑞军:《近代东北商会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20年;荆杰:《近代中国东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1861-1931)》,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收稿日期] 2022-06-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93)

[作者简介] 范立君(1970-),男,吉林大安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人口史,移民史。

学者们根据会馆的功能多将这类会馆称为科举会馆。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大,会馆这一组织在数量和形式上都有了较大变化,为商业贸易而建立的商业会馆与为联络乡谊建立的移民会馆在全国各地相继发展起来。东北地区的会馆创立时间较晚,清中叶以后,在移民浪潮、乡土情结及同乡间共同利益等因素的作用下,东北移民会馆应运而生。

顺治元年(1644),清军攻入北京,并迅速取得了全国政权。为加强统治,清廷决定迁都北京,将辽沈地区大部分旗民迁往北京,只留下少数官兵镇守,造成了辽沈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满目荒凉的景象。因此,为恢复东北地区的经济,巩固“发祥”地,入关后不久,清廷推出一系列鼓励关内人口迁往东北的政策。顺治十年(1653),清廷发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以官职和土地等吸引关内人口进入辽东,近300年的关内向东北移民活动也随之展开。康熙七年(1668),清朝废止了辽东招民授官令,开始有条件地限制关内人口进入东北。乾隆五年(1740),清廷正式发布了对东北的封禁令。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继续执行乾隆时期的封禁政策,但封禁令并没有被严格执行,而是时禁时弛,尤其是当关内遭遇大的灾害、大批灾民聚集时,统治者不得不默许这些难民出关就食。及至清末,东北边疆危机加深,沙俄强占了黑龙江的大片土地,并扬言向中国东北移民60万,清政府这才意识到巩固东北边防的重要性,在东北地区逐步解禁,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光绪三十年(1904),东北全面开禁,出现了关内向东北移民的高潮。整个清代,至少有1000万移民迁入东北地区。这场持续了近300年的移民运动,与“走西口”“下南洋”并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移民运动,其移民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巨,堪称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迹,东北地区遂成为典型的移民社会,为移民会馆的建立提供了前提条件。

会馆作为一种地缘性的社会组织,其成员主要为来自同一地域的同乡。“连乡谊,笃乡情”是大多数移民会馆所奉行的宗旨,其初衷就是为远离故土的移民提供一个可以怀念家乡、与同乡聚会的场所,这背后根深蒂固的是中国传统观念中

始终放不下的“乡土情结”。所谓“乡土情结”,是指远离家乡的人们对自己故土在情感上的羁绊,“乡土观念是支持同乡组织的一种精神力量,它是孕育于乡土自然环境,根源于乡土社会关系,陶冶于乡土文化,渐成于乡土政治地域区域的历史传统,而被乡土以外的事物所激荡成功的一种内在反应”^[1]。对乡土的依恋早已深深埋藏于中国人的心中。传统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使人们形成了安土重迁的观念,这是乡土情结产生的观念基础,从“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父母在,不远游”等诗句中可见一斑。“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中国传统社会比较认同的生活方式,但由于战乱、自然灾害、政治变动等原因,一些人被迫远离家乡,何炳棣先生认为“眷怀乡土本是人情之常,但直迄晚近,国人对乡土籍贯的观念,实较任何开化民族远为深厚”^[2]。身处异乡、环境陌生和文化不同进一步加重了移民们的孤独与不安,他们需要一种文化认同,需要有一个精神寄托,这时除了一同迁移的家人外,拥有同一生长环境的同乡便成了彼此的依靠,“籍同里井者,其情较洽;籍同里井,而于他乡遇之则尤洽”^[3]。他们会自觉地聚集在一起,表达所谓的“乡谊”与“乡情”。“天涯又是清明节,关山莽莽人离别。莫控玉骢游风沙,满眼愁,辽河冰始泮营子春潮漫,浑不见杨枝娉婷想翠眉”^[4]。这首词描绘了客居沈阳的人们在清明时节想念自己的故乡,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东北环境的不适,对家乡的深切思念。东北地区一些会馆的楹联也能反映移民对故土的魂牵梦绕,如营口三江会馆的楹联:“雅会集江扬,快海上鸥盟来依北塞,德星聚溟渤,幸客中燕集同话南邦”^[5],生动地描绘了移民们相聚一起谈论故乡人事的场景。延吉山左会馆的楹联:“匹壁图书悬故里,十年风雨话相知。树培桑梓成阴处,人间梅花信到时”^[6],渲染出深切的乡土情结。对于身处异地的人们来说,家乡的山川原野、霜雪风云都有独特的气息,乡人、乡音、乡俗都是他们不能割舍的留恋。会馆已成为流寓在外的同乡们怀念家乡的一个载体,他们通过组建一个以地缘为纽带的团体,努力在异乡延续故土的文化,以此缓解他们在异地的孤独之感,获

得心灵上的一丝慰藉。旅居在外的同乡聚集在会馆内一起祭拜乡神,用乡音聊乡事,品尝家乡的美食,组织娱乐活动等,会馆成为他们表达“乡土之情”最好的地方。家乡可能是一个人一生的归属,也可能是一个人一生的眷恋,旅居在东北的关内人士正是以建立会馆这种形式表达着他们对故乡的思念。可见,中国人传统的乡土情结是移民会馆产生的重要情感基础。

客籍商人维护自己的权益是东北地区移民会馆建立的又一重要原因。商业移民是东北移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山东帮、直隶帮、山西帮等商人群体。关内商人在东北从事商业贸易时,不可避免地会与土著商人、当地官府产生矛盾和摩擦。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营口福建粤东会馆在给营口商务总会的信函中写道:“敝帮仁裕号、振昌号、晋太丰三家日前代客装付漳州、同升、湖南、四川等轮船,有出口虾米、虾皮等货。忽被渔业公司局差留难勒捐以致耽误船期,不得已暂将该货分量报明,出立保条,乃能装载。”^{[7]87}因此,关内商人亟须一个组织为他们争取合法权益,因为“凡受国家法律保护有不完全之处,或贪婪官吏对于人民,有苛酷之事件”,则“会馆公所对于此,皆有保全生命财产判断曲直之权利,得以主张公平而裁判之。故于此时,即使对于异乡人,犹不得视为异族,而加以排斥。况其为同乡人民,尤当敦睦桑梓,联络爱情,使羁留异乡者,皆有忘其身于异乡之乐。此则中国会馆及公所所以当成立之第一原因也”。“凡所谓联乡情,敦友谊,求自治,谋公益者,皆不能不于会

馆公所是赖”^{[8]383}。商人群体不仅是东北移民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移民会馆修建与运行的主要支持者,东北地区的许多会馆都是商人出资兴建的。虽然商人在东北地区移民会馆中占重要地位,但这里的会馆按性质而言仍属于移民会馆,与商业会馆有很大区别。东北地区的会馆“大多以庙、寺、宫、观标明自己的存在,因为移民本身带有商业性,实质上与大都市和工商市镇的工商会馆有着同样的目标追求,但由于移民们所从事的多为开发性的农业、手工业或商业活动,所处环境亦与都市和市镇有异,故亦颇具自己的特色”^{[9]59}。商业会馆与移民会馆在功能上有很大不同,商业会馆注重的是与经济相关的一些贸易活动,移民会馆则更多为“敦睦乡谊”举办一些文化娱乐活动,同乡聚会活动是移民会馆的主体行为。这些活动不仅能满足移民“敦睦乡谊”的心理,而且还能帮助他们在东北获得更加安逸的生活。“中国人经商异地,侨居他处,恒多数年数十年不一归家,惟专心一力,以求达其目的者,恒数见不鲜焉”^{[8]383}。因此,保障客籍商人共同的利益是移民会馆产生的重要驱动力。

二、清代东北地区移民会馆的数量、分布及特征

随着关内移民的到来,移民会馆在东北各地相继兴建起来。关于东北移民会馆的文献资料十分有限,我们只能根据仅见的零星、片段的记载,对清代东北地区的移民会馆数量进行初步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清代东北地区移民会馆一览表

城市	会馆名称	兴建年代	兴建者	地址
海城	山西会馆	康熙二十一年	晋商	西门外大街路北关帝庙内
	山东会馆	乾隆初年	山东黄县商民	城大南门内天后宫
	直隶会馆	不详	不详	大南门里三义庙内
	三江会馆	康熙四十二年	不详	城东北一里
盖州	三江会馆	康熙四十二年	三江士商	县署前街路北
	山东会馆	乾隆三十五年	山东商人	北马路偏东路北海神庙
	福建会馆	嘉庆年间	不详	南门里偏西路北海神庙
	山西会馆	不详	不详	东门外关岳庙内
营口	山东会馆	咸丰元年	不详	阜有门内
	粤东会馆	不详	不详	不详

续表1 清代东北地区移民会馆一览表

城市	会馆名称	兴建年代	兴建者	地址
	广湖会馆	不详	不详	不详
	福建会馆	不详	不详	不详
	宁波会馆	不详	不详	不详
沈阳	闽江会馆	乾隆四十七年	福建商人陈应龙	地载门外天后宫
	浙江会馆	不详	不详	内治关外珠林寺
	湖广会馆	不详	不详	外攘关外公园南
	山东会馆	不详	山东商人	怀远关外天后宫
	山西会馆	不详	不详	怀远关外
	安徽会馆	不详	不详	外攘关外
	畿辅会馆	不详	不详	天佑门外
辽阳	山西会馆	乾隆四十二年	山西商人赵大智	城西门外关帝庙
	河南会所	康熙乾隆年间	不详	刘二堡河南前街娘娘庙内
	直隶会馆	不详	不详	刘二堡东街河北财神庙内
锦州	三江会馆	不详	三江商人	古塔区北三街天后宫
	安徽会馆	不详	不详	不详
新民	山西会馆	嘉庆三年	晋商	县治西大街关帝庙
金州	山东会馆	乾隆五年	山东船商	城内天后宫
大孤山	直东同乡会馆	不详	不详	东沟县
岫岩	山东会馆	乾隆年间	山东商人	县城西三里天后宫
	山西会馆	道光二十一年	山西商人	县城关帝庙内
朝阳	山西会馆	乾隆九年	不详	东大街关帝庙
铁岭	山西会馆	康熙二年	不详	城内中街关帝庙
吉林	山西会馆	康熙十二年	晋商郭百合、刘永祥等人	城内东莱门外关帝庙
	三江会馆	嘉庆四年	吉林将军府主事浙江籍张亚斌,吉林厅道尹扬州人陵志谦,浙江、江苏、江西籍官吏	城内三区界
	山东会馆	道光年间	山东工商业代表与抚松县县长由作霖	迎恩街山神庙内
	湖广会馆	宣统元年	知府曹怡卿	吉贤胡同
	五省同乡会馆	宣统元年	巡抚陈昭常	巴虎门外黑山头以东
	直隶会馆	乾隆年间	不详	城内西关西南窑
延吉	山左会馆	不详	不详	不详
宁安	山西会馆	不详	不详	城西大街路北
	山东会馆	康熙年间	山东商人	城东北角山神庙
哈尔滨	三江闽粤会馆	光绪末年	三江闽粤商人	正阳六道街
	山东会馆	同治年间	不详	裤裆街
五常	山西会馆	不详	不详	拉林镇十字街路北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东北地区的档案、地方志(《奉天通志》《沈阳县志》《海城县志》《辽阳县志》《盖平县志》《锦县志》《新民县志》《朝阳县志》《铁岭县志》《兴城县志》《岫岩县志》《昌邑区志》《永吉县志》)、文史资料(《盖县文史资料》《吉林市文史资料》《锦州文史资料》《大东文史资料》)、报刊(《新闻报》《吉林官报》《吉林省公署公报》《东北月报》《奉天公报》)及有关会馆的论著整理而成。

从上表可以看出,东北地区移民会馆的分布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这与当时移民聚集的数量、进入东北时间的早晚、城市经济发展程度、交通状况等密切相关。“大分散”表现为移民会馆覆盖了东北三省,会馆间的距离相对较远,没有出现具有一定规模的会馆联合即会馆群现象。“小集中”,一是指会馆集中分布在东北南部的辽宁省。二是会馆的地域类型,以山东会馆、山西会馆为最多,直隶会馆、三江会馆次之,其他地域会馆相对较少,这也反映出关内移民以山东、河北、山西籍为主的事实。三是会馆的兴建时间,集中在康熙朝至嘉庆朝时期,此时会馆的数量最多,嘉庆朝之后,会馆逐渐减少,这与移民运动的发展进程和移民心态的改变等息息相关。康熙七年(1668)以后,清廷为保护“龙兴之地”开始限制移民进入东北。乾隆朝虽实行严厉的封禁政策,但始终是严禁与弛禁并存,私自闯关者络绎不绝。仅康熙末年,山东到关外垦地者已达数十万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东北地区移民人数增至131万。^{[10]44}道光年间,关内移民已成为东北人口的主体,此时进入东北的新移民对环境的陌生与不安感大大减少,移民们兴建会馆的动力逐渐减弱,会馆数量逐年减少。

东北地区移民会馆除了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外,会馆所在城市的分布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即主要分布在交通便利的政治、经济中心及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市镇,以商埠即商品贸易的集散地——港口、码头等地方为最多。东北地区会馆是在大规模移民运动下产生的,在性质上属于移民会馆,但实际上商人是会馆的主要出资者。会馆的建立与经营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各地商人为方便在东北的商业经营也大多愿意出资兴建会馆,商人群体显然是会馆的重要组织者,因此会馆的地址与地区商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人参与会馆的兴建除基于“连乡谊,聚乡情”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商业利益,因此距离市场较近、交通便利、货物中转之地就成了会馆选址的重要标准。

沈阳是东北地区商业最先崛起的城市,是奉天省(今辽宁省)的政治、经济中心,交通网络较为完备,清朝时就已拥有驿路、河运、海运、铁路

等多种交通方式。便利的交通网有利于关内商人的进入,关内商人的商业活动为东北地区移民会馆的产生提供了资金基础。康熙十五年(1676),宁古塔将军于吉林(今吉林市)设治后,吉林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具备了兴建移民会馆的条件,成为吉林省移民会馆的重要集聚地。会馆的另一比较集中地是位于商业较为发达的港口、贸易集散地。会馆聚集的锦州、盖州、营口等地都是辽南近渤海的港口并逐渐发展为较大的工商业集镇。锦州三江会馆是东北地区影响较大的会馆,其兴建和锦州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锦州自辽天赞三年(924)设临海军管理和控制海运事宜,而后历朝均将其作为漕运之中转站。明清时,海上交通尤为发达,江浙、福建一带商贾纷至沓来,锦州的天后宫即是江浙、福建一带商人捐资修建的。^{[11]194}天后宫后经三江籍商人与航海者们捐资改建成三江会馆。盖州与营口是清朝东北地区最为典型的港口城镇。清初实行海禁政策,沿海“不准片帆下海”,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在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允许船只往来。自此,盖县西河口成为东北地区与关内通航的唯一港口。至此,“三江士商乘槎而至者,络绎不绝”^{[12]627},随之出现了“轮蹄丛集,舟帆交并”,“执三省商业之牛耳”^{[12]79}的景象。正因为盖州地区商业发达、商人聚集,为方便联络生意、储存货物,在关内商人的推动下,盖州四大会馆(三江会馆、福建会馆、山东会馆、山西会馆)相继兴建起来。咸丰年间,由于西河口出现淤浅,港口移至营口,盖州商业也随之衰落。营口的兴起,随之而来的是盖州会馆的没落与营口“粤东、广湖、福建和宁波四大会馆”^{[13]65}的崛起。由此可见,东北地区移民会馆的城市选址与其地域的政治、经济地位密不可分。

三、清代东北地区移民会馆的衰落与转型

近代以来,东北地区移民会馆遭到损害,逐渐走向衰亡。一些会馆被废弃或被改建为学校和政府办公场所,如盖州四大会馆清末民初即被改做学校:三江会馆被改为私立启明小学,山东会馆被改为私立文化小学,福建会馆被改为育英小学,山西会馆被改为县立第三小学。^{[13]65-66}一些会馆为适应时代的需求,开始调整管理模式,

部分会馆则直接转变为同乡会组织。

近代以后,多种因素造成了会馆的衰落。首先,战争给移民会馆带来了巨大破坏,许多会馆被湮没在战争中。中国东北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历来是侵略者觊觎之地。甲午战后,东北成为日俄两国激烈争夺之地。俄国战败后被迫将其在东北南部的权益转让给日本。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了东北全境。日、俄的侵略,给东北地区带来了巨大灾难,许多会馆建筑在战争中被毁坏,一些会馆的房产被侵占。如吉林“省城旧有三江会馆,近年不知由何人租借俄国,开设道胜银行”^[14];吉林三江会馆,伪满时期被日本人占据改建为临江阁;山西会馆则被改建为江神庙。其次,外国侵略者对东北的经济侵略,致使会馆日益衰落。鸦片战争后,中国失去了关税自主权与海关管理权。1861年营口开埠,外国殖民者开始向东北地区倾销商品,并以设卡抽税、增加捐税等方式排挤东北地区的商人,破坏商业秩序。“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即行使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方法来摧残华人在东北的商业。消极的方法,即加紧地更进一步蹂躏华商,例如在日本操纵下的沈阳伪市府,对于华人商店,竟任意增加捐税。每月除抽收铺捐外,并可以借口向顾客抽收消费税。而日人所设的商店,对于这两种捐税,却是完全不用缴纳”。“至于积极的方法,日人即假手于伪当局而公布日货进口无庸纳税,这种方法不仅给华商以间接的打击,并且还使日货价格更为低廉,而便于推销”^[15]。日本人的这些举措令许多在东北经商的关内商人不堪重负,只好返回家乡。东北地区商人商业的受挫必然会影响会馆的资金来源与市场投资,而缺乏运营资金的会馆必然会逐渐走向衰微。最后,移民心态、情感上的变化也影响了会馆的发展,新建会馆数量明显减少。清末,移民心态、情感发生了较大变化,对已进入东北多年并定居的移民来说,他们已适应了东北的生活环境,东北已成为第二故乡。而对于那些刚刚到来的移民,因为有先行迁移来的同乡或者亲人可以依靠,因此可以很快适应东北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对家乡的依恋也会大为减少。对家乡的依恋是东北地区移民会馆兴

起的重要原因,随着时间的流逝,移民在不断交往中逐渐融合,地域观念渐渐淡化,不再拘泥于同乡间的交往,也不再需要通过兴建会馆的方式寄托自己的情感,因而新建会馆的数量大大减少。为适应时代的需要,一些会馆开始进行自身的转型,在组织结构、职能上做出调整,一些会馆转型为同乡会继续开展活动。民国时期同乡会在东北相继崛起,如1912年6月直东同乡会在长春成立,1913年4月直隶永尊旅奉同乡会成立,1913年7月山东同乡会在安东县成立。一时间同乡会成为旅居东北人士所热衷的新兴同乡组织。同乡会的兴起标志着移民会馆的衰落,一些同乡会虽由会馆转化而来,但二者在管理机构与职能方面有较大区别。东北地区的同乡会与会馆在性质上均属于身处异地的同乡所建立的社会组织,但同乡会与会馆相比,更民主、更开放、更具有现代社团的特征。

移民会馆在近代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组织结构更趋完善。在管理体系上,会馆在民国时期发生巨大变化。之前松散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旅居东北的同乡为保留会馆这一组织就必须在管理模式上做出调整,将原来简单的轮值制转型为更加民主的董事制。此时会馆与同乡会的组织构成可概括为权力、决策、执行、监督四大机构,各项事务都有专人负责,内部管理与之前相比更规范、更完善。管理人员的选择,实行不记名投票制,董事、职员均由会员以投票方式选出,民主性进一步增强。同时,会馆通过反复修改会章,进一步明确会员的责任、义务,加强对会员的规范和管理。同乡会没有固定的会址,也没有固定的开会日期,只有在大事发生需要共同商议时才举行集会,也有部分同乡会为方便起见,直接将会址定于原会馆中。其二,功能趋向实用化。移民会馆一般具有“祭祀、合乐、义举、公约”四项职能,其中前两项是会馆的主要职能,目的是达到联络乡谊,维护同乡利益的建会宗旨。而同乡会在职能上与会馆相比更注重实用性,救济贫民、扶助同乡、赈济灾民是同乡会的主要活动。如旅吉山东同乡会对来东北谋生同乡的救助,“(一)施行同乡会募捐;(二)设收容所,凡到吉者,收容三日,供给食

宿,每名均给官贴百吊之零用;(三)收容三日,其有投奔者,听便,无投奔者,留吉,分在东西两关火柴公司作工,照章给资;(四)车站及陆路欢喜岭地方各派指导员二人指导”^[16]。在各种公益活动中,同乡会的实用功能被日益凸显出来。民国以来,东北地区移民会馆虽仍以会馆为名,但其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和同乡会并无二致,顺利实现了转型,显示出强大的社会适应力。

东北地区移民会馆形成、鼎盛于清朝,衰落转化于民国,消亡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今天东北地区仍保有一些会馆建筑的遗存^①,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见证了东北移民会馆的沧桑巨变及对东北区域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 [1] 窦季良. 同乡组织之研究[M]. 重庆:正中书局, 1943.
- [2] 何炳棣. 中国会馆史论[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66.
- [3] 李华.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0.
- [4] 延喜. 菩萨蛮:沈阳清明[J]. 吉林官报, 1907(7):8.
- [5] 解维汉. 中国衙署会馆楹联精选[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 [6] 梦蝶. 延吉山左会馆重葺落成题壁[J]. 东北月报, 1926(17):8.
- [7] 营口市档案馆. 福建粤东会馆致商务总会的函件(1908年)[M]//营口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营口近代工商企业汇考, 2017.
- [8] 东亚同文会. 中国经济全书:第2辑[M]. 东京:神田印刷所, 1908.
- [9] 王日根. 中国会馆史[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8.
- [10] 范立君. 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 [11]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辽宁省志·文物志[Z].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 [12] 沈时. 重修三江会馆碑记[A]//石秀峰,王郁云.(民国)盖平县志.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4.
- [13] 张永夫. 清代盖州的四大会馆[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盖县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盖县文史资料:第2辑, 1985.
- [14] 三江同乡会议收回会馆[J]. 吉林官报, 1907(51):10.
- [15] 君质. 东北商业总破产[J]. 国货月刊, 1935(11):1-3.
- [16] 鲁同乡会救难民[N]. 盛京时报, 1927-04-19(4).

【特约编辑 孙久龙】

The Rise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rtheast Immigrant Club House in the Qing Dynasty

FAN Liju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Jilin 136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mid Qing Dynasty, under the tide of immigration to the Northeast from the Shanhai Pass, and driven by the traditional local complex and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fellow villagers, the northeast immigrant club houses rose one after another. The immigration club houses are mostly concentrated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enters and commercial ports with relatively developed commerce,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dispersion and small concentration”. After modern tim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ar, foreign aggression, immigrant mentality and other factors, immigration club houses gradually declined, and some were abandoned or used for other purposes.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some guilds began to adjust their management models and function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while some immigration club houses directly transformed into fellowmen associations, complet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e immigration club house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stabilizing the social order in Northeast China,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ng regional culture.

[Key words] Qing Dynasty; Northeast China; the immigrant club house; fellowmen association; transformation

①如盖州四大会馆建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保存尚好,山东会馆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改建为干部招待所,后来这些会馆建筑相继被拆除改建,现仅存三江会馆一楹正殿。